

哲学史

43 洛克论宗教、伦理与政治

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撰写

其中一些内容探讨了认识论如何应用于宗教、伦理以及政治著作。或许，他认识论与其他思想领域之间最关键的联系在于证据主义，我们上次已经重点强调过这一点。也就是说，他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根据证据来调整自己的信仰。

现在，这一点在他讨论启示与理性、信仰与理性时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实际上，他在《论人类理解》第四卷的第18章和第19章中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我提到这一点是为了方便你们查阅，因为它们不在我们的选集中。这两章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启示可以被视为对我们仅凭理性所知的命题的补充。

现在，请思考片刻。你首先可能会想到的是，没错，他所说的知识是由命题构成的，这些命题体现了判断，包括命题的主语和谓语。毕竟，知识源于你对某个主语进行谓词的观念。

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启示为这种知识增添了仅凭理性无法知晓的额外命题。因此，启示就是命题启示。

你内心的正统观念或许会让你想要为约翰·洛克鼓掌，但需要注意的是，他倾向于将对神圣启示的思考局限于简单地添加命题。也就是说，宗教体验中人际间的直接性并不包含在他对启示的定义之中。我们稍后会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他似乎非常反对他所认为的任何持续不断的私人启示，例如当时一些虔敬主义传统和圣洁传统中逐渐显现的那种，甚至在卫斯理身上也可见一斑。那被称为狂热。他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反对这种意义上的宗教狂热。

正如我所说，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一切知识都是命题性的，由命题构成。因此，启示也由命题构成。一些启示的命题或许也能通过理性得知，但显然，如果它们也能通过启示得知，那么它们就不能仅凭理性得知。

他的观点是，符合理性的命题完全可以被视为启示。超越理性但并不与理性相悖的命题，同样也可以被视为启示。但任何与理性相悖、否定理性的命题，都不可能是启示。

他的观点很简单：我们通过自然理性对上帝创造之物的认知，与上帝通过特殊启示所说的话并不矛盾。上帝不会自相矛盾。但其中也蕴含着某种理性标准。

让理性指引你。理性是评价所谓启示的准则。假设确实存在此类神圣启示，那么被启示的命题就拥有所有命题中最高的确定性，因为它们仿佛是带着上帝的印证而来自我们。

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启示的内容？而这需要用理性来判断。因此，启示是由命题构成的。由此，信仰的定义也就成立了。

信仰是对命题的认可，基于命题提出者的信誉或证词。信仰是对命题的认可，基于命题提出者的证词。接下来，我将简要朗读几段他关于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论述。

理性与信仰有所区别。我认为理性是对命题或真理的确定性或可能性的发现，这种发现是通过思维运用自然能力，从自身拥有的观念出发进行演绎推理而得出的。也就是说，是观念。通过感觉或反射感知。

因此，理性是对通过自然方式获得的观念推导出的命题的确定性或可能性的发现。而信仰则是对任何并非由理性得出，而是基于提出者认为其来自上帝，并通过某种非凡的方式传达的命题的认同。这种向人类揭示真理的方式，我们称之为启示。

所以，信仰是对某个命题的认同。你或许会问自己，这就是他对信仰的全部理解吗？这似乎是一种纯粹的认知行为。正是在此背景下，他才提出了他所谓的热情、私人启示、内在之光式的启示，就像贵格会传统中所描述的那样。

他摒弃了这类东西。没有理性的启示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启示和理性缺一不可。

洛克似乎在言辞上相当谨慎。我认为，他未说出口的话比他说出口的话更有问题。但就他所说的话本身而言，似乎为一种独立于启示的宗教研究方法打开了一扇门。

因此，人们常常将18世纪自然神论的发展归因于洛克的无意影响，也就是说，人们认为仅凭理性就能获得大量知识，而自然神论正是试图仅凭理性，独立于启示，来发展一种宗教观点。所以，自然神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洛克。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早在洛克之前，英国就已经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自然宗教的相当活跃的发展。

有时是在柏拉图式的语境中，但自文艺复兴以来，它一直在发展。也就是说，宗教完全基于自然知识，不依赖启示。因此，一方面，自然神论是这种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它的发展似乎也受到了洛克认识论的启发。

好的，有什么问题或评论吗？嗯。那么，洛克认为基督和玛利亚的存在是否超越了理性？不，他本人不仅接受启示的可能性，也接受基督教的启示，接受圣经。在他的著作《基督教的合理性》中，你可以看看。

他运用我们之前提到的那种理性标准来审视基督教，而根据你采纳谁的解读，他可能被视为一位彻头彻尾的正统基督徒。他谈及基督时，更侧重于基督作为弥赛亚的身份，而非基督作为三位一体中道成肉身的第二位。但只要快速浏览一下这本书，就能明显看出，这是他试图将圣经教义整合为某种连贯的教导。

那是他的著作，《基督教的合理性》。他还有另一部关于宗教的著作，名为《论宽容的信》。或许，读过这本书有助于理解本文的背景。

这发生在17世纪末，当时英国刚刚经历了一场内战，这场内战是宗教和政治冲突的交织。英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詹姆斯二世最终在1688年的一场不流血革命中被废黜。你可能还记得，新教徒威廉和玛丽从荷兰来到英国，夺取了王位。

所以当时一直存在这种紧张气氛，人们的包容度很低。事实上，正是在那段时期，《五英里法案》获得通过，禁止非英国国教徒，也就是持不同政见者，在一定规模的社区五英里范围内进行宗教活动。

我童年时对这件事的意义有一些有趣的记忆。我成长于英格兰东南部的多佛，在一个浸信会家庭长大。在那间教堂里，这是一种习惯和习俗。

每个耶稣受难日，几乎整个教会都会步行五六英里，前往乡间一个名叫艾索恩的小村庄，庆祝那座能容纳六七十人的小教堂的周年纪念。肯特郡其他地区的教会也纷纷效仿，沿着这条路线汇聚到艾索恩——坎特伯雷、福克斯通、赫恩湾、马盖特、拉姆斯盖特、桑威奇代尔，如果你熟悉肯特郡那片地区的话。你知道，直到我回忆起19世纪宽容法令颁布之前，浸信会教徒在家乡进行礼拜的种种限制，我才意识到他们当时的处境。

你看，这是17世纪末的约翰·洛克，他主张宗教宽容。他主张理性至上，倡导信仰自由和实践信仰的权利。是的。

那么，在这种冲突情况下，除了某种理性的平衡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嗯，除了理性调解争端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权力政治。你看，这就是如今美国大学政治化，以及政治正确运动的本质。当然，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下。

约翰·洛克是个非常有趣的人物。好的。道德知识。

他的认识论如何应用于伦理学领域呢？首先，正如你已经读到的，不存在与生俱来的道德观念，也不存在与生俱来的道德知识。他的经验主义否定了这种可能性，而他对与生俱来观念的反对也正是基于此。

约翰·洛克提出了反对先天观念的论点，例如不同文化间信仰的多样性等等。他认为，我们所有的道德知识，如同其他任何知识一样，最终都必然来源于我们简单的感觉和反思。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指出，我们获得道德知识的方式有三种。

一种方法是通过论证。你记得他说过知识有三种：直觉、论证和感觉。

嗯，凭直觉是不行的，但通过论证是可以的。我们可以从对上帝的认识和对自身作为理性存在的认识中推导出道德知识。当然，凭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洛克也愿意说我们认识自身作为理性存在。

我是什么？我是一个会思考的生命体，一个理性的生命体。所以，当他在《论公民政府》一文中谈到人权时，他试图阐明的是，一个理性的生命体所应具备的特质是什么，以及我们作为理性的生命体这一事实可以推导出什么。事实上，他还有一部篇幅更长的著作专门探讨这个问题，名为《论自然法》，或者说《论自然法则》，它实际上是一篇关于自然道德法则的论文。

正是基于此，他论证了这种道德知识的重要性。获得道德知识的第二种途径来自感觉和反思，来自经验，也就是说，由于上帝将道德与我们的幸福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实践中，快乐和痛苦往往成为我们的道德导师。

仅从所涉及的经验概率来看，我们就能得出一些关于我们愿意做什么、不愿意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结论。的确如此。你会注意到，道德上的正确性变成了实际效用的问题，因此洛克无意中又一次为功利主义铺平了道路，而功利主义很快就会发展起来。

顺便一提，他并非第一个持此观点的人。回顾培根和霍布斯，你会发现他们都重视知识的实用价值。霍布斯的整个伦理和政治理念都围绕着避免所有人之间互相残杀、实现生存与和平这一至关重要的实用价值展开。

因此，获得道德知识的第二种途径是……。获得道德知识的第三种途径来自圣经启示。圣经教导我们许多道德问题，而圣经中赐予的神圣道德律法是最终标准，是判断道德对错的最高标准。

因此，他的认识论及其在宗教领域的应用，最终导向了他所倡导的那种伦理观。现在，让我们再从人类自由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点。请记住，我们正处于机械论科学的时代。

原因、结果、机制。因此，像霍布斯这样的人变成了彻底的决定论者。不存在真正的意志自由或行动自由。

另一方面，笛卡尔试图通过将心灵——即思维本身——置于科学因果机制之外，来维护人类的自由意志。他的身心二元论正是维护意志自由的关键所在。洛克在这方面与笛卡尔的观点颇为接近。

他想维护自由，人类的自由。但他将人类自由定义为按照自己的选择行事的自由。

做或不做我想做的事的自由。行动的自由。至于意志自由、自由选择的问题，他认为争论毫无意义。

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争论，因为它混淆了两个范畴，把人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的能力混为一谈。

做或不做事的权力。行动的权力。另一方面，思考和选择的权力。

是的，我们确实会思考和反思自己的行为。我们确实会更倾向于做某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但偏好很可能是人为造成的，而非自由选择的。

思想和思考同样源于感官世界的变化。因此，自由的并非欲望、渴望或意愿本身，因为欲望、意动、意志深受因果观念的影响，真正自由的是行动。所以，当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时，他便拥有了行动或不行动的自由。

这与笛卡尔的观点略有不同。他与笛卡尔的相似之处在于，他认为行动自由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是反思的存在，反思我们的行为并采取行动。

但他与笛卡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谈论的与其说是意志自由，不如说是行动自由。行动自由。而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对于一个被赋予行动自由的理性人而言，其固有属性就是被赋予行动自由。因此，他对自由的理解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权利理论。正如各位上过任何涉及权利理论的伦理课程的人所熟知的那样，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

如果我拥有生命权，你就应该赋予我生存的自由。如果我拥有财产权，你就应该赋予我拥有财产的自由。自由和权利是相辅相成的，你看。

所以，洛克正是基于这种人类自由理论来探讨政治哲学问题。而他在第二篇《政府论》中所做的，才是真正重要的。第二篇《政府论》。

他的第一篇论文是对当时其他政治观点的回应。第二篇论文是他自己提出的建设性方案。它建立在我们之前提到的道德知识概念和自由概念之上。

你可以看出，他区分了自然状态和公民社会。在自然状态下，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拥有自由行动的能力。在自然状态下，我们都是享有平等自由和行动自由的个体。

因此，我们拥有平等的行动权利。他由此宣称，在自然状态下，我们拥有自然权利。这些权利并非由公民社会赋予我们的。

宪法或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这些是上帝赐予我们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是自由行动的能力。他列举了其中三项权利。

生命权，即自由行动的权利。生命权先于自由行动的权利，因为人必须活着才能行动。第三，是财产权。

尽管洛克非常谨慎地指出财产权并非无限，但他有时仍因强调财产权而被认为是自由企业制度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如果你阅读他的《政府论》第二篇，你会发现他在论述美洲殖民化问题时也同样强调了这一点。

他认为，开垦土地定居的人有权享受他们在土地上劳动所得的果实和产出，只要他们只取够自己和家属所需，并留给他人足够的份额。这很有意思。约翰·洛克也说过，要给别人留些东西。

这与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等当代作家在其著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如果你熟悉相关文献的话）中所倡导的无限财产权截然不同。因此，约翰·洛克（John Locke）转而论证财产权。随着他对自然状态的阐述，我们很容易看出，这正是他对清教徒传统中所了解的造物主旨意的诠释。

创造的使命意味着，在开垦从未耕种过的土地时，我们有责任去征服、去统治、去管理，但要取其精华，留其益。这就是管家的使命。好的，所以他提出的是一种自然权利理论，一种自然法，一种我认为更符合斯多葛学派传统的自然法，这种自然法更合理性存在者，而不是托马斯主义传统中的自然法。托马斯主义传统强调目的论和某些自然倾向等等。

在于，在自然状态下，我们拥有这些权利。拥有权利也意味着拥有主张和捍卫这些权利的权利，以及抵制剥夺这些权利的企图的权利。

因此，在自然状态下，人有权抵抗针对自身生命的暴力攻击。人有必要抵抗剥夺自身自由和奴役自身的企图。人也有权抵抗剥夺自身财产的企图，抵抗窃贼。

因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谈到了上帝赋予的权利。公民社会正是在这种需要中发展起来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契约安排。

一种契约安排，使我们的共同生活受到理性原则的约束，以维护和增进我们的自然权利，以实现正义，确保人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从而使他们能够恰当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现在，民用 因此，社会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契约关系。这包括婚姻，他认为婚姻是一种受理性支配的契约关系。这还包括主仆关系，我想，在他那个时代，他所指的“主仆关系”既包括学徒关系，也包括雇佣关系。

它还包括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政治共同体——政府。这些都是契约关系。因此，他为社会和社会伦理设定了契约论基础。

神授截然不同，但与托马斯·霍布斯笔下的契约安排也大相径庭。在霍布斯的理论中，人们出于对生命安全的恐惧而放弃所有权利。而在洛克看来，这并非是向君主放弃权利的问题。

这是君主努力维护和增进这些权利的问题。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安排。因此，他想要的是一种宪政政府，一种有宪法制衡、权力分立、对君主权力、对战争、革命等中使用武力施加道德限制的政府。

所以，他运用自然权利理论来阐述他的政治理论。嗯，关于洛克，我想我们只需要讨论到这里就够了。你明白这其中的逻辑和连贯性了吗？瑞恩？我质疑他如何将他对启示道德的理解与他的概念主义相协调。

我的意思是，如果存在一种启示性的道德，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必须存在于我们自身思想之外，存在于我们关于这种道德的观念之外。是的。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对道德的观念是什么？你看，对于中世纪关于普遍性的实在论而言，你对道德的观念就是对真实普遍性的观念，这些普遍性是形而上学的实体，它们要么在自然界中发挥作用，要么在某种柏拉图式的意义上是超越性的。

对概念主义者来说，你的想法，你的概念，可以是上帝想法的体现。明白了吗？但这样一来，它们岂不就成了真实存在且独立于上帝之外的事物了吗？哦，不，想法并非像普遍真理那样真实存在。你看，概念主义者承认上帝拥有想法。

上帝拥有普遍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普世概念。所以，概念主义者最终所做的，我认为在中世纪的阿伯拉尔身上就显而易见，那就是：我们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才能知道上帝对此事的看法？因此，洛克的道德知识途径实际上可以归

纳为三种，通过这三种途径，我们可以了解上帝对人类道德的看法，以及人类道德应有的样子。

一种方法是从理性存在的意义出发进行推论。上帝创造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理性存在。这意味着什么？另一种方法是从人生经验中得出。

上帝创造生命就是为了让生命以这种方式运行。你看，我们在人生旅途中会学到什么呢？一种显而易见的普遍道德法则。第三种是启示。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了解上帝的想法。上帝非常明确地指出，经验主义方法，即从经验中学习，只能提供一定程度的概率。这三种方法中最可靠的是启示。

所以我认为概念主义者和认为我们可以知道上帝想法的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概念主义者否认的只是独立存在的实在形式，也就是希腊意义上的普遍概念。那么奥古斯丁在这方面又如何呢？你不是说过他认为这些是上帝心中的观念吗？是的，但它们也是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实在原则，即种子理性（*rationes seminales*）。

你看，永恒的，永恒的理性，上帝心中的永恒形式，是上帝的预设。但自然界中的理性是形式。是的，所以奥古斯丁是个现实主义者。

阿奎那也是如此，原因相同。大卫？我不敢问关于阿奎那的问题，因为我读洛克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阿奎那的名字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是的。

它们完全不同还是相似？嗯，你看，我刚才说了阿奎那是一位实在论者。是的，一位在普遍性方面持温和实在论观点的人。因为他认为存在某种普遍的、真实的原则，这些原则与个体、人、生物体、以及所有物质存在都息息相关。

真正的原则在起作用。不仅仅是物质与进程的关联，而是一种内在的、内在的形而上学原则，正是这种原则造就了这一切。

你看，洛克并不是那样说的。当洛克谈到自然权利和自然法时，他指的是人类普遍特征、人类本质中逻辑上隐含的东西。

记住，本质只是一个概念。人类的本质在于我们是理性存在。你明白吗？阿奎那不是也说过，通过观察自然，我们或许可以……是的。

是的，但是你看，作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阿奎那，看待自然的方式与非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洛克截然不同。阿奎那运用亚里士多德认识论来看待自然，他试图从物种的累积经验中抽象出其中起作用的真实本质，也就是起作用的真实形式。

洛克现在谈到抽象概念。但请注意，他说我们所做的，是从我们所有简单的概念中抽象出它们的共同之处。它更像是一种普遍概念，一种抽象的普遍概念。

你看，这种形式不是一种概括，它不仅仅是一种共性，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

洛克追求的其实就是共性。是的，这其中确实存在细微的差别。但是，你也记得，托马斯·阿奎那和概念主义之间的区别并没有那么大。

记住，当他试图做出区分时，那种含糊不清和语无伦次的感觉。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是的，珍妮尔。你能把概念主义定义为一种政治哲学吗？他谈到了自由、行动的权力，以及思考或偏好的权力。

在我看来，他似乎更看重行动的权力，而不是思考的权力。而美国的大部分权利正是建立在行动的权力之上的。我不确定行动的权力是否比思考的权利更现实。

你看，他整个伦理体系，包括他的政治理论，其基本前提是我们是理性存在。我思故我在。你知道，他反复强调这一点。

如果基本前提是我们是理性生物，那么这个前提最好是真的。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了。你看。

我们之所以拥有行动的能力，仅仅是因为我们是理性生物。如果我们没有行动的自由，那么我们的理性对他来说就没什么意义了，我想。是的。

培根和霍布斯都是这么说的。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观念，我们谈到了简单观念、复杂观念和抽象观念。

首先想知道的是，抽象概念是否属于复杂概念的一种？是的。他确实在讨论复杂概念的章节中谈到了抽象概念。但你也记得，他后来在讨论语言哲学的章节中又再次提到了它们。

换句话说，他很清楚，抽象概念远不止是简单的经验概括。你看，当我说人是理性生物时，我的意思不仅仅是说所有人都会思考。

你看。他是这么说的，那就是人的本质。那么，如何才能触及本质呢？你看。

嗯，这是我们概念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正是通过对这个基本特征的概念化，我们才得到了这种抽象概念。是的。

因为本质特征的概念本质上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嗯，我们不妨这样说。对阿奎那来说，你是从经验中抽象出一些非经验性的东西。

对于洛克来说，你要抽象地思考在具体案例中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事物。我注意到你刚才一直在默念这些话。让我再说一遍。

在阿奎那的理论中，你抽象地思考的是一些无法通过经验观察的事物，即普遍原则。而在洛克的理论中，你抽象地思考的是一些在具体情况下可以通过经验观察的事物。

但你要抛开所有细节去思考这个问题。是的。我想这就是我能想到的最接近他们谈论这个问题的方式了。

是的，是的。他会很快这么说。他总是很快这么说。

嗯，我想他会想说圣经里没有任何内容与理性相悖。那会是什么呢？哦，如果有人说他得到了神的启示，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你看，那岂不是自相矛盾的启示吗？自相矛盾的启示。

好的，我再试一次。如果他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说逻辑法则无效，那么所有圣经真理也就都不成立了。

是的，他似乎是在说，所有圣经教义要么符合启示，要么超越启示，但并不与启示相矛盾。我刚才说的是启示吗？算了，当我没说。所有圣经教义要么符合理性，要么超越理性，但并不与理性相矛盾。

是的。我想这就是约翰·洛克发挥作用的地方。至少它不能与那些已被确信的结论相矛盾。

是的，你看，正是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19世纪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读过一些关于这一时期历史著作的人，比如马克·诺尔（Mark Knoll）的著作，就会发现他和其他历史学家一样，谈到了培根式的科学理想，也就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经验科学。这种理想在18世纪不仅被洛克所接受，也被我们稍后会提到的苏格兰现实主义者所接受。而正是这些对19世纪英国乃至美国基督教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苏格兰现实主义者，才促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现实主义——一种对科学的现实主义理解。

所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科学的真理主张与宗教的真理主张之间自然会存在一些冲突。你会问，不然你如何理解科学呢？科学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表达，但仅仅谈论表象，因为终极实在并非物质的本质，而是精神的本质。时至今日，在科学哲学领域，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之争仍在继续。

如果你关注过创造科学，记得创造科学与进化论之间的争议，那么在我看来（我并没有深入研究过），创造科学运动中存在一种对科学近乎盲目的现实主义观点。他们并不是说科学不能告诉我们关于现实的信息，而是说真正的科学可以，但进化论不是真正的科学，创造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所以，问题就变成了两种对科学的现实主义解读之间的冲突，究竟哪一种才是正确的？

也有人会说，科学只能告诉你某些特定的操作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才能观察到后续的后果。因此，科学无法告诉你现实的本质，尤其是过去的事情等等。所以，这并不矛盾。

还有一些人会说，等等，科学本来就不是那么客观的。它或许试图告诉我们关于现实的信息，但科学工作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预设。借鉴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也就是科学革命的结构——他们认为，尽管科学可能意在告诉我们关于现实的信息，但它实际表达的内容远比个别科学家通常意识到的要模糊得多。我很好奇拉克究竟对卫斯理宗和宗教热情有什么意见。

是的，他似乎认为那些狂热分子把他们获得的、无法验证的私人直觉当作启示。但他们却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性使然。因为这些直觉是私人的，所以无法用理性来检验。

它们并不公开。我昨天读了莎拉·迈尔斯博士发表在最新一期《展望》（*Perspectives*）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该杂志是美国科学联盟（*American Scientific Affiliation*）的会刊。我想应该是十二月刊。

你以为一月份那期是最晚的？不，其实这篇刊登在十二月刊。她在文中探讨了十八世纪的科学和神学之争，并在最后一部分专门讨论了那些狂热的信徒，特别是卫斯理。

仔细看看。还有哪些后续后果可以观察到？所以科学无法告诉你现实的本质，尤其是过去的事情等等。

所以这里不存在冲突。当然，也有人会说，等等，科学本来就不是那么客观的。它或许试图告诉我们关于现实的信息，但科学工作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预设。借鉴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也就是科学革命的结构——我们可以认为，尽管科学可能旨在告诉我们关于现实的信息，但它实际表达的内容远比个别科学家通常意识到的要模糊得多。

我很好奇拉克对卫斯理宗的热情究竟有什么意见。是啊，他似乎认为这些狂热分子把他们获得的某种私人直觉奉为启示，而这些直觉根本无法用理性来检验。没错，它们不受理性检验，因为它们是私人的。

它们并不公开。我昨天读了莎拉·迈尔斯博士发表在最新一期《展望》（Perspectives）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该杂志是美国科学联盟（American Scientific Affiliation）的会刊。我想应该是十二月刊。

你以为一月份那期是最晚的？不，这期在十二月刊。她在里面谈到了十八世纪的科学与神学之争，最后一部分则专门讨论了狂热分子，特别是卫斯理。

看看这个。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了。我认为你更需要说的是科学的暂时性，科学变革的事实，以及科学并非像拉尔克时代人们认为的那样客观、经验确定的事实。

你明白吗？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这里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诠释学问题，这些问题远比洛克时代人们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所以我认为洛克开了一个好头，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问题的复杂性。我认为，直到20世纪科学和文本诠释中对人类主观性的强调出现之后，人们才能如此清晰地认识到诠释自然和诠释启示中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正因如此，诠释理论才显得如此重要。

埃斯特？你是说洛克的著作里有提到吗？没有。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任何地方谈到过这一点。他写的不是护教论。

因为，我的意思是，他声称圣经是启示的来源。是啊，是啊。我在想，如果洛克本人没有论证圣经是启示的说法，那么洛克的支持者会如何论证呢？我认为洛克的支持者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证。

第一，假设我们已经有效地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一位能够自我启示的、具有人格和理性的神，那么至少存在启示的可能性，或者说合理性。因此，你必须审视关于启示的说法。你认为应该如何评估启示的说法呢？嗯，如果启示的内容与理性相悖，那么这就会被否定。

如果它符合理性，即使它超越了理性，那它仍然是可以接受的、可行的。你能进一步增强这种可能性吗？那么，在那些与理性相吻合、存在某种理性依据的地方呢？而英国护教学在洛克时期之后发展起来的，正是我上次提到的证据主义护教学方法。因此，这种方法的尝试是在圣经中寻找能够被历史证据所证实的论点。

诸如此类。换句话说，就是试图确定经文内容的真实性。这可以通过历史证据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论证其一致性和连贯性来进行概率论证。

19世纪后期发展出一种额外的程序，试图避免一种隐含的循环论证。如果它是启示，它就一定是真的。它是真的，所以它就一定是启示。

不，那并不能证明什么。你看，那只是在肯定结果。为了避免这种循环论证，我们不妨这样说：圣经中关于耶稣基督的论述，是关于他所宣称的真理。

未必在此刻自称神明，但他声称自己所言属实。基于此，你需要评估：他所言属实吗？如果属实，且他认可启示的权威性，那么至少存在启示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你必须审视关于启示的宣称。

你认为应该如何评估启示的主张呢？嗯，如果启示的内容与理性相悖，那就会被否定。如果它符合理性，即使它超越了理性，也仍然能够被接受和接受。你还能增强其可信度吗？那么，在它与理性相符的地方，在那些可以找到理性依据的地方呢？而英国护教学在洛克时期之后发展起来的，正是我上次提到的那种证据主义护教学方法。

因此，其目的在于寻找经文中能够被历史证据证实的要点，等等。换句话说，就是试图确定经文内容的真实性。这可以通过历史证据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论证其一致性和连贯性来进行概率论证。

19世纪后期发展出一种额外的程序，试图避免一种隐含的循环论证。如果它是启示，它就一定是真的。它是真的，所以它就一定是启示。

不，那并不能证明这一点。那只是肯定了结果。为了避免这种循环论证，我们试图指出，圣经所宣称的一件事，就是在这个节点上宣称神性。

它声称自己讲述的是真理。那么，根据这一点，你要评估一下，他对自己所说的话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并且他认可圣经的权威，即圣经的启示权威，那么接受他的权威，就等于接受了圣经的权威。这是普林斯顿神学家B. B. 沃菲尔德提出的一种论证思路。

这是否足够，是争论中的问题之一。但总的来说，洛克对护教学的影响是朝着证据主义的方向发展的。你如何证明相信圣经确实是神的启示是合理的？他提出的问题是什么？证据是什么？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不出他具体在哪一处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得查查基督教的合理性。

但我可以根据他所处的传统大胆推测：堕落的影响与其说是作用于思维规律本身，不如说是作用于我们遵守思维规律的能力。不是作用于思维规律本身，那不是我们。

但这取决于我们遵守思维规律的意愿、情感和道德能力。偏见、盲目等等，等等。好吧，我们最终还是得放弃。

还有其他人试图闯入。